

承傳與創新：新世代的歷史學

學術會議

2007年12月1日至3日

黃興濤

(中國人民大學)

〈經學的怪胎：清末民初「傳教士經學」初探——兼談 近代中國學術史研究的路徑問題〉

提要

經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中堅。其在近代中國的演變和命運仍然研究得很不充分。比如，20世紀初年的康有為經學就一直缺乏一種整體的把握和透視。整個清末十年新式學堂裏的“經學教育”、“經學史”的興起等問題，至今也都還無人加以專門深入的探討，等等。其實，這些問題如果不研究清楚，所謂的“經學走向邊緣、史學走向中心”就只能是一句並不落實的空話。

清末民初，在當時的正統經學家眼中，體現和導致經學走向衰落的學術形態，無疑是康有為等援西入儒的野狐異端——今文學派的“猖獗”，但在筆者看來，這還只是從內部揭示了其經學的“異變”，此外，還有一脈來自外部的異變，即“傳教士經學”的活躍，它也同樣成為了正統經學走向衰落的不祥形態——我視之為“怪胎”。

所謂“傳教士經學”，指的是傳教士面向中國讀書人，直接以中文撰寫經學著作，從事儒家經典的注釋和白話翻譯等活動，並且公然採取“經學”的名義、以間接在華傳播基督教的一種特殊經學形態。

這種獨特的歷史文化現象，在清末以前不曾出現，但顯然又與明清以來來華傳教士和中國教徒徐光啟等人“會通耶儒”的行為具有一脈相承的歷史關聯。那時，傳教士的儒學研究著作主要面向西方，用西文撰寫。而以中文撰寫的耶儒會通和比附的論著，則多屬赤裸的傳教

宣傳品，在形式上也決不敢取“經學”名義、或以經學家自居。但時至清末，情況卻發生了變化。有的傳教士“自信”膨脹，以精通經學自任，用基督教的道理解經，並直接面向中國士人。它們還對康有為的今文經學進行回應，並開啟了儒經白話翻譯的先河。

對於上述怪異的經學形態，筆者關注多年，積累了不少資料，冒昧地命其名曰“傳教士經學”，力圖對其中所蘊涵的豐富內容予以揭示和解讀，並借此就深化中國近代學術史研究的途徑問題，也談點自己的感想和思考。